

· 专题：百年党史与社会保障发展成就和经验 ·

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建构

——以民生和治理为两翼

童 星

【摘 要】 西方学界形成了一整套多视角的社会建设话语体系，如结构视角、政策视角、价值视角等。由于它们缺少对中国国情复杂性的体验、对中西话语内涵差异性的认知和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连续性观察，并不能为中国社会建设实践提供指引。将中国历史传统资源和当今社会建设实践相对比，可以发现“民生”和“治理”如同两条红线贯穿始终。它们作为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的“两翼”，分别揭示了社会建设的目标和工具。在“温饱—小康—富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生和治理演化、互动，先后形成温饱目标下经济民生工具为主导、小康社会目标下共建共治共享为主导、共同富裕目标下现代国家治理为主导等三个组合形态，从而形塑出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的结构。民生价值指向共同富裕，治理工具指向共同体建设，二者殊途同归，都通往“大同”社会。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小康”和“大同”思想，仍然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关键词】 社会建设；话语体系；民生；治理；小康；大同

一、引言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带。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既体现本国特色与风格、又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建设的地位空前提高。在社会建设实务层面，各级党委政府透过提升政治站位和贯彻执行各项社会建设要求，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体制优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 2020 年，中国完成精准脱贫历史任务；2021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社会建设研究层面，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们紧密围绕

【作者简介】 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应急管理、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研究”（20STA051）。

①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

着“社会建设”^①“民生发展”^②“社会治理”^③等核心概念进行持续的研究，为社会建设的实践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撑。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还是初步的、零散的，尚未形成中国社会建设的本土话语体系。因此，实践发展的需要和理论自身的完善，都呼唤着我们反思源自于西方的社会建设话语体系，提炼总结中国当代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一系列具有本土性的概念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以讲好中国社会建设的故事，丰富世界社会建设的理论宝库。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多视角的社会建设话语体系。

一是持结构视角，“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其核心概念。在这一话语体系中，社会建设被归结为优化社会结构，亦称“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优化的实质在于社会分层合理、社会流动通畅。社会建设的目标则是建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以使上层不敢懈怠，中层持续努力，下层不会绝望，整个社会既有秩序又有活力。

二是持政策视角，“效率”和“公平”是其核心诉求。这一话语体系在将国家、市场、社会三分的基础上，强调政府要利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均衡，以经济政策保护财产权，追求效率，以社会政策关注公共性，确保公平。或者说，经济政策偏向资本主义，社会政策则偏向社会主义。

三是持价值视角，“个体自由”和“社会共识”都不可或缺，但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这一话语体系竭力在“个体自由”和“社会共识”两端之间寻求相互连结乃至统一的载体，因而特别关注“社区”和“社团”。社区基于地缘关系在自由的个体之间形成共识，社团基于业缘关系在自由的个体之间形成共识，从而使社会成员既张扬了个性自由，又凝聚为层次不同、特征各异、规模不等的共同体。

这三种不同视角的西方社会建设话语体系，尽管在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显现了身影，但很明显，中国的社会建设实践并非以上述任何一种话语体系为指引。这是因为，西方社会建设话语体系根植于西方社会情境，对于解释中国社会情境尚有诸多不适应之处。一是缺少对中国国情复杂性的体验。从积弱积贫的基本国情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国在几十年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社会建设面临着转型社会和现代社会相互交织的情境，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群体差距悬殊，问题纷繁复杂。西方现成的社会建设话语难以提供解释和指引。二是缺少对中西话语内涵差异性的认知。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理论来自于西方学术体系。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以及百余年间中西文化交流的曲折性和非对等性，导致中西双方对同一现象常常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对同一概

① 陆学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童星：《新时代民生概念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1期。

③ 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

念又常常存在不同的认知,需要做认真的比较、分析和鉴别。三是缺少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连续性观察。社会建设实践丰富生动,并非一日之功。仅凭片段和碎片化的证据难以从历史进程中深刻把握社会建设规律,更不符合总结提炼中国社会建设经验的基本要求。总之,现实国情的复杂性、话语内涵的独特性、实践发展的连续性,都是建构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时必须考量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充分考量对本土实践的提炼总结,单纯依靠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推导可能难以行得通,需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建设的制度与实践之中来凝练其核心价值导向和政策演变规律。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一直按照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三大建设的格局来谋划发展。只不过毛泽东的年代将政治建设列为三大建设之首,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邓小平的年代则将经济建设列为三大建设之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相应而言,从事三大建设的单位分别被称为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农村由于分工不发达,则组建一大二公、五业俱全的人民公社。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社会建设”并将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但在1980年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时,已将“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建设”概念;200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列专章部署社会建设任务;2006年,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来谋划布局;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将社会建设界定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至此,五年一次的全国党代会和五年规划,每年都发布的中央全会公报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这些最权威的文献都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些最权威文献以及4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的中国社会建设实践,就成了我们总结提炼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的客观源泉。

二、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

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中的许多做法也都可以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到端倪。因此,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传统资源的挖掘。将中国历史传统资源与当今社会建设实践相对比,可以发现“民生”与“治理”如同两条红线贯穿于始终。“民生”与“治理”既是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各项制度文献和工作实践中出现得最多的“热词”,成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话语;也是土生土长的中文“古词”,绝非由国外文

明传入的“舶来品”。

首先，作为中国建设价值话语的“民生”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出现在 2000 多年前的文献《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明代何景明在《应诏陈言治安疏》中指出，“民生已困，寇盗未息，兵马弛备，财力并竭”，将民生与治安、国防、财政并列，且排在其首。《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对“民生”的解释都是“人民的生计”，^①指老百姓的生活来源。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一文中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可见，民生，泛指人民、居民的日常生活事项，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但因其涉及范围太广，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直到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孙中山先生准确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的时代课题是争取独立、民主、富强，为此制定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即以民族主义争独立，以民权主义建民主，以民生主义求富强。自此，民生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进入到中国现代化过程。^②随着时代演变，民生更是成为了兼具宏观价值和微观目标的社会建设话语。这与西方的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话语体系有相似之处，即民生所反映出的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始终未变，而民生概念则随着时代变化其内涵也不断延展。

其次，作为中国建设工具话语的“治理”一词，也源自于中国传统，而非简单的外来语。诚然，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掌舵、引导和操纵。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试图与传统的“统治”概念进行切割；^③并以此取代“管理”概念。前者如罗西瑙，他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明确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不是同义语，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都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④后者如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该委员会在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做出了一个高于“管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与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那些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并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⑤在全球化与人类政治、

①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909 页；《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年，第 1804 页。

② 童星：《新时代民生概念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 年第 1 期。

③ Jean-Pierre Gaudin, "Modern Governance, Yesterday and Today: Some Clarifications to be Gained from French Government Polic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50(155).

④ James N. Rosenau, Ernst Otto Czempie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

⑤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3.

经济、社会生活发生大变革的背景下,治理的概念日趋流行,以至于杰索普坦言,“治理一词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的‘时尚词语’”。^①

然而,在汉语里,“管理”和“治理”二词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据《汉语大词典》,“管理”的释义为“料理、治理”“过问、理会”“管束”等,^②“治理”的释义则为“管理、统治”“得到管理、统治”“处理、整修”等,^③可见二者是相互界定、语义一致的。从词源学角度来看,与英文相反,在汉语里“治理”的出现远远早于“管理”。“管理”作为外来语,是到近代以后才从日本传入的,而“治理”早就见诸于许多古籍。例如:《荀子·君道》中有“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汉书·赵广汉传》中有“壹切治理,威名远闻”;《孔子家语·贤君》中有“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六·风异》中有“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关治理”;直到现代瞿秋白《乱弹·水陆道场》中也还有“然而阿斗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昏庸无用,所以就把全权交给诸葛亮,由他去治理国家”之语。显然在汉语古籍中,“治理”乃“治国理政”之谓也!

虽说人们在对治理的含义和使用范围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学者们还是对治理的解释有着一些共识。斯托克认为,“治理的实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④他总结出目前有关治理概念的五个基本结论:(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公共机构和社会行为者。(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5)治理意味着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除了政府权力的运作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治理概念的内涵在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治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概念,“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环境治理”“舆情治理”“风险治理”等被广泛使用,而就社会建设话语体系中的治理的本土内涵而言,社会建设中的治理话语也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社会建设中的治理概念更多在实现民生目标所需要的工具层面,典型的如“共建共治共享”就是一套达成社会建设目标的工具,这也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话语。

① Bob Jessop, "The Rise of Governance and the Risks of Failure: The C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50(155).

② 《汉语大词典》(第8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1202页。

③ 《汉语大词典》(第5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1126-1127页。

④ Gerry Stoker,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50(155).

三、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及演变逻辑

在提炼出具有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的两个核心概念之后，还应当概括和构建这一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民生与治理作为中国社建设话语体系的“两翼”，分别在价值层面和工具层面形塑出社建设的两个基本议题。第一个议题是“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体系是什么”，回答当然是保障和改善作为价值的“民生”。然而，民生总目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定体现为不同的社建设具体的目标设定，而这一系列具体目标设定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口号层面，还要通过一系列具有工具性的配套措施予以落实。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议题，即“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体系如何实现”，回答是依靠具有工具性的治理方式来保证。既然目标体系具有发展的阶段性，那么保障落实这些目标体系的工具体系也必然具有发展的阶段性。在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时代变迁设定相应的社建设目标，由此又创新出达成该目标的方略与工具。处于演化中的价值目标和工具方略互动、适应、磨合。跟踪梳理“民生”和“治理”的演变与互动，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规律，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自然就能构建起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共中央就提出了“三步走”的国家现代化战略，即：第一步，1981—199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 年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相应而言，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也就有以下三个价值与工具层面的组合形态。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基本结构与演变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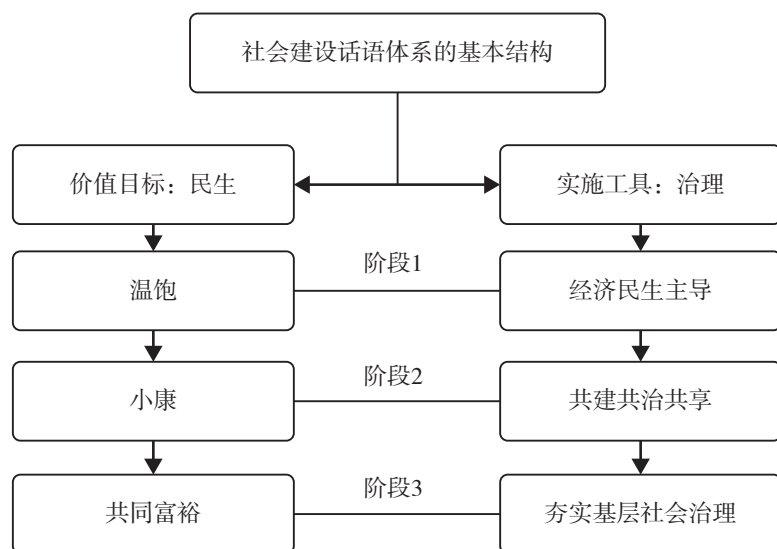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基本结构与演变

1. 以温饱目标下经济民生工具为主导的社会建设话语

民生概念从模糊到清晰,从作为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逐渐转变为现实实践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过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于是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力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以后,“因发展不足和缺乏效率而未能让全体人民过上预期的幸福生活,民生因国家发展的历史局限性而改善缓慢”。^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生理念日渐清晰,为了实现全民温饱的目标,将反贫困斗争作为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从扶贫工作阶段历程看,20世纪80—90年代解决普遍式贫困的发展性扶贫、2000—2013年解决区域式贫困的开发式扶贫和2014—2020年解决个别性贫困的精准扶贫。^②中国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构筑了全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③

与此同时,治理工具从政治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手段为主。1980年以前,我国处于“短缺经济”时期,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大家“绑在一起穷”;在思想观念上,人们认贫为命甚至以穷为荣,不敢也不愿脱贫致富。邓小平提出民生发展的基本方略在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并鼓励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然后让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不断攀高,这也为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福利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经济保障。诚然,在2004年以前,我们还没有正式提出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概念,但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就业、教育、医疗、居住等民生老问题,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又开始重视养老问题,只不过是把它们纳入经济建设或文化建设的框架中。社会建设话语往往是以从属于经济建设话语的形态出现,在工具层面经济手段占据了社会建设的主流话语。例如,在经济建设的话语中部署保障就业,在文化建设甚至是经济建设的话语中谈论发展教育,等等。在以民生理念指导民生实务、用民生实务落实民生理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理念与实务之间的冲突。可见,早期以经济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话语并未能真正形成影响力,治理手段单一,社会政策往往从属于经济政策,以经济建设逻辑来评判和设计社会建设。

2. 以小康社会目标下共建共治共享为主导的社会建设话语

民生概念逐渐拓展到并固着在五大领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用“小康”描述中国式现

① 郑功成:《习近平民生思想:时代背景与理论特质》,《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3期。

② 童星:《贫困的演化、特征与贫困治理创新》,《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8-08/19/content_5314959.htm?from=groupmessage,2020年6月10日。

代化，1979年12月6日，他在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①他后来又多次阐释“小康”，最概括也最形象的解释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②并且强调：“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③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经济民生扩展到相关制度建设；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直至习近平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④新时代的民生思想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不忘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增进民生福祉的根本目的；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主线，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动力，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原则，坚定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做保障，以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评价标准”。^⑤为了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落实民生理念，需要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实务。那么，当前人民群众生计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哪些？对此，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将民生聚焦于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五大领域或五大问题，要求到2020年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具体而言，民生建设就是要“三管齐下”：首先从供给侧改革发力，发展好这五项事业，即扩大就业、发展教育、保障医疗、增建住房、促进养老，使人民群众不再受“就业难、读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的困扰。其次要全力完成精准脱贫任务，因为即使上述五项事业发展上去了，少数尚未摆脱贫困的人群也无法享有事业发展的成果，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国务院扶贫办规划了“五个一批”的实施途径，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再次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对人的生命周期和职业生涯中难免的生老病死、失业、工伤、职业病等风险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对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对因各种各样原因陷入困境者实施社会救助。2021年，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2页。

⑤ 童星：《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民生建设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018年第1期。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向全世界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①

治理工具从单一经济手段走向共建共治共享。共建共治共享作为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实现社会建设目标的基本工具，本身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早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纲领时就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的就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②这就指出了经济繁荣成果要让人民共享。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明确社会建设的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共建共享”，社会建设的总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③从而将成果共享的范围由经济建设成果扩展到社会建设成果，还以列举的方式提及教育、收入、医疗、养老、住房等主要方面的成果共享，并将共享与共建密切联系起来。2017年，中共十九大又将社会治理纳入民生建设的范畴，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④关于民生建设的论述不仅在原有的“五个有所”上增加了“幼有所育”“弱有所扶”，而且增加了“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容，以实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目标。既然广义的民生建设包含了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的原则也就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共建共治共享。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治理工具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已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所超越。由于共建，必然能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由于共治，民主协商、合作共赢从基层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必然会稳步地推进国家民主进程的进步；由于共享，必然能凝聚民心、凝聚共识，形成建立在共同利益、共同文化价值观基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16日第1版。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3. 以共同富裕目标下现代国家治理为主导的社会建设话语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紧扣推动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出了涉及6个方面共20条重大举措，允许浙江省先行先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做出示范。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强调“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①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按照习近平关于“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②的指示精神，要求将发展导入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将安全注入发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治理工具则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长期以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一直是我们的优势。改革开放以后，先是允许市场调节发挥作用，接着是培育和发展市场，继而确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又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政府+强市场”的理论和实践导致国民经济迅速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理应与政府、市场并驾齐驱、相互补充的社会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育和发展。^③基层社会管理普遍采用依托政府科层组织结构的行政命令，科层制的缺陷在社会领域暴露得十分明显，站在管理的不同部门和层级上，又会出台不同的管理措施，科层冲突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在统筹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失衡。社会事业发展也不适当地依靠市场化即资本的介入，资本逐利的本性也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不利于人民群众共享社会事业发展的成果。鉴于相对于政府和市场而言社会是短板这一实际状况，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党中央提出了“保基层运转”的要求，并将其列入国家宏观方针之中，各项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都开始向基层倾斜，这不仅确保了疫情防控的需要，而且大大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绩效。这期间，中国社会治理特别强调要“精准”“精细”，这就对治理工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各地纷纷加强网格化、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借助于高新技术由科层制管理走向网络型治理，由粗放型管理走向精细化治理；另一方面，探索全过程民主和基层自治，依托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的重建来增进官民平等互信，将协商民主和网络技术相结合发展出网络协商民主，实现确保参与各方的平等地位，通过信息公开、资源共享，夯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jump=false，2021年8月17日。

② 习近平：《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新华网：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4/c_118270861.htm，2013年11月24日。

③ 童星：《从科层制管理走向网络型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路径》，《学术月刊》2015年第10期。

实社会治理的科技基础和群众基础,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四、中国社会建设话语体系的当代价值

民生价值指向共同富裕,治理工具指向共同体建设,二者殊途同归,都通往“大同”社会。“大同”又是一个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中令人向往的理想境界。早在《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如下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当然,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也清醒地认识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这番论述深深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封建士大夫们。进入近现代以后,康有为、孙中山和早期共产党人更是发扬光大了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和小康思想。康有为的头号门生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称,康有为治《春秋》,提出了“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据乱升平,亦谓之小康,太平亦谓之大同,其义与《礼运》所传相表里焉。小康为国别主义,大同为世界主义;小康为督制主义,大同为平等主义。凡世界非经过小康之级,而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

孙中山则将他的三民主义与儒家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既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文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他最喜欢题也是题得最多的字就是“天下为公”。为了实现“公天下”,他身体力行,奋斗终身。

早期共产主义者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中汲取营养。“共产主义”一词是“舶来品”,但与之类似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天下大同”则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仁人志士的不渝理想。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提出未来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结合的新组织;^①“各个性都有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

^① 《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7-598页。

景运。”^①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忆道：“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则找到了这条“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的路。^②

在古代圣贤和近代仁人志士的理想信念中，“大同”与“小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大同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小康则“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是本质之别；由此推导出大同与小康在秩序、法则、吏治、人伦、社会诸方面的不同。联系则在于：小康是奔向大同的必经之路，大同乃小康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大同与小康的联系中，作为制度安排的社会保障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本质上讲，社会保障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一方面，个人和家庭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和缴费义务；不仅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给付面向参保个人、部分可在家庭成员中转移继承，而且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项目也要落实到个人和家庭；违反社会保障规章乃至骗保行为等，都还要受到法律法规的制裁。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也已包含了某些大同社会的因素，如古代圣贤关于大同社会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憧憬，不正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使命和全体“社保人”的初心吗？！

因此，贯穿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小康”和“大同”思想，仍然具有当代价值和全球意义。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③

① 《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3页。

② 《毛泽东选集》（全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474-1476页。

③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Constructing a Discourse System for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Governance

Tong Xing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Western academia has formed a whole set of multi-perspective social construction discourse systems, including structural, policy and value perspectives. Since these discourse systems lack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plexity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iscourses, and the continuous observation of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they cannot provide guidance for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Considering China's history and tradition, as well as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we can find tha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Governance" are like two threads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As the "two wings" of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discourse system, they reveal the goals and tool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respectivel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Subsistence-Well-off-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people's livelihood and governance evolve and interact, successively leading to three combinations: focus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goal of satisfying basic subsistence needs; focusing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with the goal of a well-off society; and focusing on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with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us,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discourse system is shaped. The values of people's livelihood point to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tools of governance point to community building, both of which lead to the "Great Harmony" society. The ideas of "Well-off" and "Great Harmony", which have existed in China's history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still hav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ocial construction; discourse system;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ance; well-off; great harmony

(责任编辑: 郭 林)